

人工智能恐慌与

科技焦虑管理

■ 吴岩

近期,人工智能带给社会普遍的焦虑。一方面,我们不清楚人工智能到底会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人类生活。持有极端看法的人认为:人工智能正在“人化”,在建立“世界模型”,未来很可能替代人类,甚至与人类为敌。更多的人觉得,至少在参与战争、取缔人类多重职业等方面,大模型引导的人工智能热潮会起到巨大作用。

面对这些紧张和焦虑,首先应该肯定,一个社会对科技进步的预警是必要的。没有这种预警,人类就没有能力做好对未来的准备。从历史来看,中国恰恰是在国际局势重大变动的时代保持了对科技进步的预警,才在“两弹一星”、信息技术、航天、生命科学等方面赶上先进水平,让我们免于受到更大威胁。如果没有全社会对第三次浪潮的积极反应,我们不会有21世纪今天的工业和科技水平。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过度焦虑对个体和群体以及整个社会是消极的。个体会感到惶恐,失去对未来的希望;作为整体的国家、民族和社会也将感到巨大的焦虑和威胁。

这一切说明我们缺乏对科技焦虑的整体认知。没有这种认知,就做不到管理和消解焦虑,更做不到化被动为主动。因此,建立科技焦虑的测评和管理机制就显得特别重要。通过各种渠道传播正确的科技信息,让公众了解每一项科技进展的真正含义,了解当前的世界前沿发展水平,是避免造成误解和加重焦虑的重要方法。

以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人工智能技术新品为例。我认为,公众必须对人工智能技术有充分的认知。首先,人工智能当前的发展,特别是基于神经网络技术的发展,其根基还是20世纪60年代生物学家休伯特和维瑟尔对猫的视觉皮层神经细胞层级结构的分析。仅仅对大脑一个小小部分的工作方式的了解,就构造了今天的卷积神经网络的基底。其次,我们还要理解,自组织系统在超越一定规模之后所发生的整体涌现构成它的个体不具备的新特性的所谓“涌现现象”。这种功能导致了Open AI所创造的人工智能的诞生。上述两个核心的科技并不复杂,而且已经出现很久。前者暗示我们,如果对动物神经系统做更多的研究分析,更多种类的不同心理活动的模拟完全可以被不断发现。而自组织涌现的出现,则让人们相信,加大系统的规模,可能会导致一些过去无法想象的事件。这让更多人试图在各类研发中创造大的系统,期盼大的规模导致的自组织现象的出现。

但这两个简单的基础也让我们看到,当前的人工智能的水平和能力其实是有限的。充其量,当前的人工智能是一种生物体智力的小部分的复制与有限的增长。这种增长基于人类提供的材料,也就是语言或视觉信息,人工智能开始反射性地提供了一个属于自己的认知世界。这就像身边有个孩子,大脑非常简单,但非常庞大,

能用这种大规模的脑叠加,苦干之后创造一些与智力相关的成果。这种成果类似我们过去表扬的吃苦耐劳的人。但这些人是否能创造真正具有超越人类认知水平的成果,至少在这个层次上看起来不出来。因此,我认为当前的人工智能发展状态是非常好的。就像办公室来了一个智力高超的同事,这个同事具有我们的认知方法和苦干精神,能协助我们做好许多智力工作。面对这样的人,不用恐惧,反而应该欢迎他的到来。

从心理学角度看,智力跟驱动力、情感、自我意识、个性等是完全不同的心理活动。应当庆幸当前的人工智能没有被赋予人类的多种心理功能。但我们必须警惕科学工作者对这种机器叠加上其它的功能,让它们具有驱动力、自我意识、情感和个性方面的追求。这些才是真正把人类送到不稳定状态的真正祸根。换言之,对机器的“全人培养”,是一条人类跟机器关系的红线。全人培养的来临是葬送人类命运的最终关口。

所以,站在人类中心主义立场,一个高智商的机器,其智力能力不用在驱动从事某种自主活动,都是不可怕的。它造成的人类生活的改变,都是可以接受的。当前包括Sora在内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都没有在基础上动摇人类社会基础,完全可以不用担心。反而是要通过对焦虑的管理,让社会回到稳定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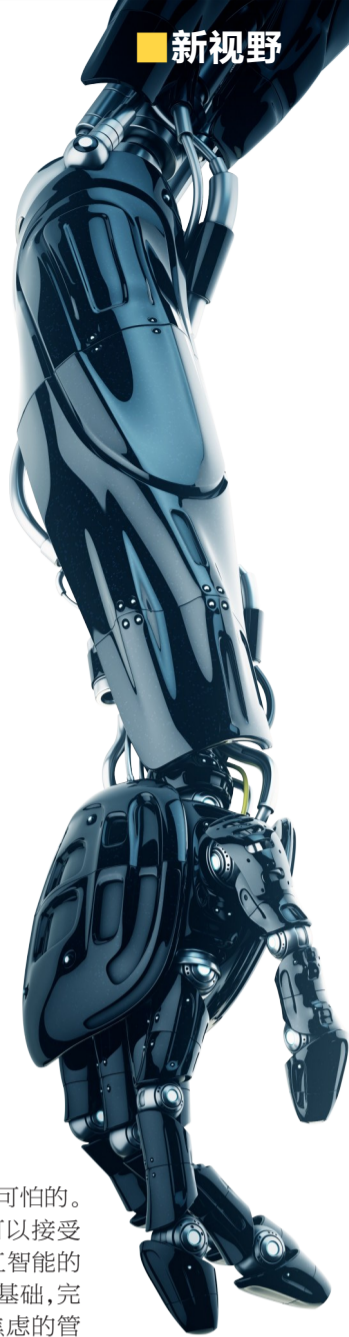
所以我认为,对当前人工智能的焦虑,重点应该放在关注人类对脑认知真实过程的揭示上,因为这种揭示可能制造出更多模仿人类心理的机器。超越智能方向的模仿,值得紧密关注。

其次,大模型对大算力的消耗导致的能源消耗。而地球上只有有限的能源。所以,今天的这种大模型并非真正合适的人工智能形式。在未来,朝向开发更类似动物大脑的小能源消耗智能机器的目标前进是减轻人类负担的形式之一。

第三,科技焦虑在人群中导致惶恐情绪,对已经产生的民族自信起到破坏作用。而解除焦虑的方法之一,就是让大家看到真实的自我和世界。免除过高的期待同时抱有对发展的信心和渴望。

历史的经验是未来前行的保障。在一定限度的焦虑下推动符合人类道德的技术突破,是我们对社会负有的责任,也是人类未来发展的立足点和点对科技与人类关系的正确态度。

(作者系南方科技大学科学与人类想象力研究中心主任)



■新视野

不能将AI发展视为纯粹的技术问题

■ 刘永谋

2024年开年,人形机器人、脑机接口和大模型等新技术进展,不断成为社交媒体追逐的热点。面对AI技术带来的冲击,智能革命是否使人与技术的关系发生重大改变?人类应当如何面对以AI为代表的新技术之迅猛发展?笔者试图厘清相关现象,并尝试思考和回应这一议题。

对AI话题娱乐化倾向保持警醒

某种意义上,社会层面的AI话题具有一定程度的娱乐化倾向。首先是研究方向娱乐化。这一波AI热潮发轫于2016年Alpha Go战胜李世石的围棋比赛。之后,AI热门发展方向是聊天、写短文、虚拟人以及生成图片、短视频,而非提升或改造实体经济和制造业。其次是公司组织娱乐化。不难发现,Open AI、Neuralink等新技术公司非常重视通过公关宣传吸引流量。第三是技术推广方式娱乐化。从现实来看,往往有企业家乐于扮演“科技超级英雄”的角色,埃隆·马斯克和萨姆·奥特曼就是典型。还有媒体炒作“AI觉醒”“AI威胁论”吸引大众眼球。与AI有关的评论往往贩卖AI恐慌,言辞激烈,消费大众情绪。

审慎应对人工智能“颠覆式冲击”

AI娱乐化传播能够发挥作用,也与其对当代社会广泛而持续的颠覆性冲击有关。以Sora、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例,就目前显示的迹象来看,至少会导致以下三个方面的挑战:失业问题,它可能导致政策规划

人员、原画师、视频制作人员、工业设计人员、程序员等脑力工作者大量失业;教育问题,它可能冲击既有的教育科研系统,比如学生可以用ChatGPT写论文,Sora可能影响视频制作相关专业的招生;信息安全问题,它将自动生成海量的人工智能生产内容,真伪难辨、权属不清、追责困难,甚至可能成为挑战主流价值和意识形态的危险工具。

Sora、ChatGPT等的兴起,标志着人类开始进入AI辅助生存社会。在AI辅助生存社会中,人类的生活、学习和工作都将在AI的帮助之下完成。也许不需要太久,机器人便有能力取代人类所有的体力劳动和绝大部分的脑力劳动。机器人不眠不休,完全可以将科技生产力提升到难以想象的高度。当AI替代劳动社会完全到来,理论上智人很快会迎来地球增长极限。在极限到来之时,科技智人得设法使人类文明在地球之外站住脚跟,否则可能被锁死或逐渐衰退。彼时,AI可能将经济不平等推向极端:大量被AI代替劳动后的“无用之人”,没有劳动报酬如何养活自己、抚育后代呢?类似这些随之而来的社会问题值得警醒。

对新技术发展进行预先研究

AI巨大的冲击力,突出体现了20世纪下半叶兴起的新科技革命的一大特点,即新科技的影响深入到社会每个角落,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这正是新科技发展日益成为公共事件的根本原因。当前,新科技不仅满足于改造外部世界,它的力量开始深入人类社会,包括人的肉身与精神。在社会运行层面,当代社会已然成为技术治理社会,尤其是智能治理社会。在个体生存层面,基因编辑、人体增强和脑机接口等新科技,不断引发世界性的关注,其中蕴含的改造人自身身心的冲动昭然若揭。在技术新世界中,人必定成为技术的重要场域。因此,智能革命方兴未艾,人与技术的关系正在发生不可逆转的改变。

有关新科技的影响,有人发现,人

类总是在短期内高估它们的社会冲击,却低估它们的长期效应。关于新科技的风险,也有科学家谈到,在没有充分应用之前,很难预料它们可能导致的社会风险;但当新科技风险充分暴露之后,却已经错失控制风险的良机。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的未来命运可以归结为在新科技锻造的新世界中冒险。因此,一系列AI新工具大规模应用之前,必须对它可能导致的社会冲击和科技风险进行认真、全面和深入的预先研究,逐步推进,努力规避,实时调整,寻找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之路。

AI发展须以人为本、以善为根

无论如何,都不能将AI发展问题仅仅视为纯粹的技术问题。应对新科技风险,必须同时考虑远景和现实两方面。从远景来看,解决这个问题,将牵涉到人类社会制度的根本性变革。机器人理论能够取代人类劳动,并不等于实际取代人类劳动。从本质上说,解决AI导致的失业问题,要不断减少劳动者的工作时间,给人们更多的闲暇时间,最终必须要彻底消灭剥削制度。20世纪的劳动史表明,现代科技在生产中的运用,持续减少着总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推动“八小时工作制”和“双休制”被越来越多国家所实施。

从现实来看,社会发展要历经很长时间,也要等待智能技术不断地发展。正如《教育的未来: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变革》作者约瑟夫·E·奥恩所言:“人类在应对技术和社会变革时,总是以改善教育作为回应。”教育是应对AI失业的重要措施,教育需要努力培养出适应AI辅助生存社会的劳动者。

总之,面对新科技风险,人类必须行动起来。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走AI发展的有限主义道路。而哪些为、哪些不为,应该由全社会共同决定,而不是科技狂人和大资本说了算。AI的发展须以人为本、以善为根,为人民服务,为提升社会福祉而努力。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讲席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关注

拉美科幻的本土性与混合性

■ 乔安娜·佩吉 江玉琴



乔安娜·佩吉 (Joanna Page): 剑桥大学教授, 剑桥大学艺术、社科与人文研究中心主任。专长于拉美科学与文化关系研究



江玉琴: 深圳大学教授, 深圳大学人文学院数字人文研究中心主任, 主要从事数字人文、后人文主义与科幻学研究

江玉琴: 佩吉教授, 您是拉美科幻研究专家, 也是英语世界中拉美科幻的传播者和研究者。您的相关著作显示了您的学术发展路径: 从单一国家的科幻研究到拉美地区的文学与文化研究, 并进而展开科技与艺术、文化的跨学科研究, 学术领域在逐步拓展与深化。您能谈谈您的学术历程, 并介绍您是如何走上拉美科幻研究道路的吗?

乔安娜·佩吉 (以下简称佩吉): 我的学术生涯并没有任何预先的规划, 只是跟着感觉和兴趣走。读本科时, 我阅读了博尔赫斯、科塔萨尔的作品, 开始爱上阿根廷文学。攻读硕士学位时, 接触到里卡多·皮格利亚的作品, 我对他丰富的想象力和复杂的文学世界非常着迷。博士论文以皮格利亚小说作为研究对象, 为我打开了认识阿根廷文化的大门。我还对阿根廷电影很感兴趣, 这也是我第一本书的主题, 正好契合了21世纪初兴起的探讨电影制作、虚构和纪实电影的新浪潮。之后, 我开始转向思考阿根廷文学与文化中的科学观念。当然还持续了之前的研究主题, 但已经开始转向研究文学、电影、图画书、视觉艺术、表演艺术等媒介文化。我还参与了一些项目, 这些项目涉及更广泛的拉美地区。每一个项目研究对我而言都是一次探险, 不断面对新鲜又具挑战的内容, 不断进行新的写作尝试, 我很享受这个过程。

江玉琴: 在《阿根廷科幻文学: 物质化多元宇宙中的文本技术》中, 您发现了阿根廷科幻的存在形态, 并构建了阿根廷科幻文学框架。您是如何发现阿根廷文学的不同语境, 并认识其独特的科幻文学发展路径?

佩吉: 我做科幻文学研究前读了大量科幻作品, 但我并非是从从小就阅读科幻的“科幻迷”。从这方面讲, 我进入科幻领域比较晚。我对科幻的定义很简单, 在我看来, 科幻是处理与物质世界、物质经验相关的问题, 而不是处理某种幻想或超自然的问题。这涉及阿根廷的文学语境。阿根廷最发达的文学是幻想文学, 幻想文学影响了其他很多文类。在我最初开始研究时, 人们都认为阿根廷根本没有科幻文学这种文类。我于是提出, 阿根廷实际存在着一个完全不同于英语世界的科幻文学传统, 这种传统也不同于阿根廷盛行的幻想文学。阿根廷科幻文学主要通过物质主义的方式介入文本和世界。幻想文学通常引导读者思考文本是否是一种景致, 真实世界是否也只是一种幻象。但阿根廷科幻文学则展示了完全不同的文本链接, 那是一种扎根于物质性世界的文类, 与世界共享相同的物质, 受到相同力量的塑造;

另外它还构建了一种将阅读视为具身活动而非仅仅脑力活动的哲学。因此, 尽管在很多方面都利用了奇幻文学的主题和手法, 阿根廷科幻文学依然可以被看作是与奇幻文学相对立的文类, 因为它致力于理解我们嵌入其中的物质世界, 包括我们自己和文本。

江玉琴: 您能根据阿根廷科幻小说的发展历史, 向中国读者介绍一下阿根廷科幻小说的全貌吗?

佩吉: 阿根廷并没有公认的科幻文学经典。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 阿根廷的许多科幻作家, 比如莱奥波尔多·卢贡内斯和阿道夫·比奥伊·卡萨雷斯, 都把科幻作为一种可能性进行探索。我认为这可能勾勒出阿根廷科幻小说完全不同于奇幻文学传统的谱系。阿根廷科幻小说作为一种新的文类形式, 早在胡安娜·曼努埃拉·戈里蒂蒂于1865年出版的小说《倾听者可以听到》中就初见端倪。小说讲述了一个催眠的案例, 但并非作为一个超自然现象, 而是基于自然科学的一场实验。19世纪早期阿根廷科幻小说最重要的作家可能是爱德华多·拉迪斯劳·霍姆伯格, 他是一位以进步主义立场著称的科学家。他的作品将科学和推想狂热结合, 展现了因大规模移民导致的深刻社会文化变革, 以及在这种语境中文学出版的权力和国家的现代化政策。

20世纪上半叶, 阿根廷科幻小说通常致力于探索新视觉技术的力量, 正如奥拉西奥·基罗加在20世纪20年代出版的几部短篇小说, 以及阿道夫·比奥伊·卡萨雷斯于1940年出版的小说《莫雷的发明》中所展示的那样。在独裁统治时期

(1976-1983) 及以后, 阿根廷科幻文学在漫画、图画小说, 以及电影中尤为兴盛, 探索了威权主义威胁, 以及身处欧洲文化边缘的城市生活和现代性的复杂体验。而马塞洛·科恩和保拉·奥洛伊萨拉克等当代作家则将科幻小说作为探索后人类主义以及新自由主义与生物资本主义相结合的方式。

总的来说, 阿根廷的大多数科幻小说采用的都是“软”科幻形式, 它们主要关注社会或政治问题, 而不是采用严格的科学方法来想象新技术发展。阿根廷几代科幻作家改造了科幻这一文类的固有概念, 以应对具体的阿根廷政治环境和全球经济与社会的变化。

江玉琴: 您将阿根廷科幻小说描述为与后人类身份相关, 是对拟像以及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产生的社会或心理推想, 这非常类似于菲利普·迪克的《尤比克》。而且您认为, 阿根廷科幻还糅合了殖民主义批评、H.G. 威尔斯《世界大战》的回忆, 以及厄休拉·勒古恩《一无所有》中所探讨的不同形态的社会与经济体系。除此之外, 阿根廷科幻还致力于创造一种基于压迫文化的敌托邦想象, 这个主题也接近雷·布拉德伯里的《华氏451度》。看起来阿根廷科幻受到英美新浪潮科幻的综合影响。您能说说这种影响趋势背后的原因吗?

佩吉: 科幻中有很多普遍性的主题。阿根廷文学总体上是有意识通过文本展开与全世界文学(特别是欧洲文学)的对话。影响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 很难追溯其中清晰的痕迹。我在著作中使用的方法是, 呈现阿根廷科幻如何在19世

纪图画阿根廷文学。

尤其是, 阿根廷文学传统镶嵌在与欧洲文学和北美文学的对话中, 从这个层面来看, 它并非简单的影响与被影响关系, 因为有时阿根廷作家本身就在对欧洲发生的事情进行批判性和创造性的回应。很多阿根廷作家会长时间待在欧洲, 更多当代作家喜欢将欧洲生活写进书里。他们本身也混迹在欧洲各种文学社群中, 比如巴黎、巴塞罗那或者欧洲其他城市的文学社群。这让他们自己的写作成为一种实验。比如博尔赫斯在很多作品中就融合了一种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的风格, 有些甚至是对乔伊斯作品的重写。但当然它是从不同时代、不同的语境并联合很多其他因素展开的一种重写。

江玉琴: 参照美国科幻史中对科幻创作的分期, 在拉美科幻文学史中, 是否存在类似的黄金时代、新浪潮时代或赛博朋克时代的划分?

佩吉: 实际上, 我认为重要的是, 在拉美科幻中始终存在一种与来自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对话。比如提到赛博朋克、蒸汽朋克、新浪潮等科幻文类的时候, 拉美科幻都有体现。但在拉美科幻中, 有些科幻形式来自不同的文类。因此我感兴趣的是与阿根廷19世纪文学产生关联性的文学形式, 很多科幻文学则来源于某些更早时期探讨科学、现代性、进步等观念相关的文类, 他们也可以归类为科幻文学。如果说拉美科幻的差异性, 我想阿根廷科幻具有一种混合传统, 这在拉美其他很多地方也存在。

江玉琴: 图画小说通常被归类为大众文化或

通俗文化。拉美科幻为什么特别盛行以图画小说的形式来表现?

佩吉: 科幻类别在拉美的图画小说中特别成功。原因之一就是拉美地区较少科幻电影, 科幻电影需要高预算和科技加持, 很多导演不太擅长把握这些技术。原因之二是图画小说制作相对便宜。现在, 学术研究界对图画小说的兴趣非常浓厚, 因为图画小说是一种极具多才多艺和创意的文学体裁, 作者可以将文本和图像创造性地结合, 这也挑战了对文本和图画关系的传统认知。

江玉琴: 您如何理解拉美图画小说中的后人类特色?

佩吉: 拉美图画小说对物质主体的浓厚兴趣, 也成为批判性后人文主义思想探索的一部分。批判性后人文主义质询人类对被动的、情性物质所具有的优越性和主体立场。很多图画小说还探讨了不同形式的文本和媒介的主体性, 比如技术怎样与我们交织在一起, 并为我们创造可以生活的世界。当传统图书出版发行不稳定的时候, 这些图画就开始以各种电子形式和文类方式在市场上出现。它们穿行在二十一世纪复杂的媒介生态中, 并给出它们对人类与技术新关系的理解。

江玉琴: 您提到, 霍尔赫·巴拉迪特和奥特加·塞博格想象重构原住民神话, 复活了智利文学中的幻想传统。您能谈谈智利文学中的幻想传统在当代的延续吗? 您如何看待这种以赛博格想象重构原住民神话的做法?

佩吉: 他们的作品非常丰富, 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进入。我认为用赛博格想象的方式来重构原住民神话非常有意义, 他们将原住民文化从“落后”“原始”的范畴中移除, 因为这种概念是殖民时代的产物。特别重要的是, 他们的作品是以阿根廷本土的方式来理解技术现代化, 而非将本土认知与技术现代化分离, 更不是将原住民认知方式看作是前现代的产物, 或者将两种文化进行对立。他们会在作品中探讨, 如果智利的自由主义没有获得胜利, 国家会怎样。他们对现代性持这样一种批判性观点: 既承认现代性国家的独特性, 但也要充分认识到它是建立在殖民剥削基础上的。

江玉琴: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希望您可以将更多的拉美科幻研究成果带向世界。

[本次访谈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赛博格叙事与21世纪科幻诗学建构”(22BZ175)的阶段性成果]